

河北党史资料



— 1 —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河北党史资料

第一辑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石家庄

前 言

河北省党的组织在全国党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所创建的北方党组织的基地。六十多年来，无论是在党的创立和地下党时期，还是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生过闻名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出许多对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中夏、蔡和森、何孟雄、王荷波、陈潭秋、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彭真等都曾在河北斗争生活过。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也在河北工作和战斗过。河北党组织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与建设经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丰富的宝藏。因此，把河北省党的六十多年的历史资料征集、整理出来，编史立传，借鉴历史经验，发扬革命传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四化大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为了进一步发掘、积累和交流党史资料，促进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党史编写工作，早出、出好这项精神产品，满足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党员干部的需要，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河北党史资料》。本刊为资料性的内部刊物，随第一辑出版后将陆续出版。发行范围：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党团干校、大专院校、军事院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及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和组织部门。集体和个人均可购阅。

《河北党史资料》的主要内容包括：没有发表过的或新发现的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党史专题资料、专题访问记、革命回忆录、人物介绍或传记、重大事件的记述、史料考证、综合整理的重要资料等，同时转载、介绍党的报刊上发表的有价值的河北党史资料。

我们恳切希望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给予支持，并踊跃投稿。稿件一经采用，即酌付稿酬。

来函来稿请直接寄：石家庄市石岗大街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河北党史资料》编辑室。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回 忆 录

- 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唐 铎 (1)
- 红色摇篮——乐亭中学.....徐凌汉 (25)✓
- 回忆保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王森然 (33)
- 玉田的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张明远 (57)
- 白区工作局部情况的回忆.....马辉之 (121)
- 直南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革命史.....晁哲甫 (139)

专 题 资 料

- 马列主义在保定的传播.....朱赤整理 (181)
- 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赵云山 王章书 (199)
- 彭真在正太铁路总工会时的革命活动
.....石家庄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11)
- 一九二二年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的罢工斗争
.....张家口市总工会工运史小组 (223)

小 资 料

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

.....保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39)

考 证

对《中共党史人物传》中《邓培》一文若干史实的

意见.....王士立 (242)

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唐 铎*

一九一九年前后，我国青年学生中蓬勃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它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又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而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坚定走十月革命道路，坚信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革命信念。今天，在我国人民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的大好形势下，回忆当年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倡导、组织下，我跟随蔡和森、李富春、蔡畅、陈毅、李维汉、肖子璋、陈绍休、贺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等同志，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经过，心情无比激动。由于时隔久远，回忆的情节难免遗漏和不正确，望同志们予以补充、指正。

* 唐铎：原名唐灵运，湖南人。一九二〇年赴法，一九二一年被中法反动当局押送回国，后赴苏学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曾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1953年从苏联回国，曾任辽宁大学副校长。一九八三年去世。

(一)

留法勤工俭学，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他们为了向西方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动员一些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看到学习外国革命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经验的极端重要性，在湖南、四川、广州和北京等地，更加积极倡导和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在湖南，积极倡导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我就是在他们倡导和组织下，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

一九一七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因为是师范附小，只收伙食费，不收学费，所以，我们穷苦人家的少年才能进校读书学习。我在附小读书期间，是李维汉同志任学校主事，肖子璋（肖三）同志担任音乐、英文教员，陈赞周（绍休）同志担任物理教员。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肖子璋和陈绍休同志还组织部分同学成立了“童子军”。我和任培国（即任弼时同志）、任培安（弼时弟弟）、肖拔等人都参加了。在暑假期间，肖子璋和陈绍休同志还带领我们到岳麓山野营，借以锻炼身体，增长知识才干。我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正在第一师范学校第一部读书。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的作文经常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礼堂里展出，我们附小的同学看了以后，都很佩服。由于毛泽东文章出众，贺果田

径超群，当时一师流行一种“文是毛泽东，武是贺果”的说法。我记得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肖子璋、肖子升等人，当时以湖南长沙楚怡学校为根据地，经常集会，谈论挽救中国的问题。后来，这些同志大部分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附小的主事开始是李维汉同志，之后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一七年冬，我从附小毕业了。家中没有钱再供我读书，我只好返回老家——湖南省益阳县岳家桥，同我的父兄一起种田。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对这种失学的痛苦，感受还是很深的。我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机会再去学习。

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战争驱使许多国家的大批劳动力去前线当炮灰，造成了田园荒芜，农、牧业和工业大量减产。法国也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人员死伤惨重，劳动力极端缺乏。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惨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英法帝国主义就从中国招募华工数十万人，去为他们制造军火，修筑道路，或在码头、车站装卸货物，或在食品厂、机器厂等处当工人。所以在那里，很多行业都有华工从事艰苦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同志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出了“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中国广大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吴玉章同志早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就从四川动员了一批青年到法国去留学，据吴老回忆说，何鲁等人就是这次出国的。因为交通不便，又不安全，在大战期间，去法勤工俭学的人很少，大战结束之后，发展很快。他们在法国巴黎和国内的

北京、上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在四川、广东等省还设立了分会，组织勤工俭学活动，同时还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也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一九一八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恰在这时，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同志来信，告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大约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家乡突然接到我的老师陈绍休来信，告诉我说，湖南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招收穷苦不能升学的青年北上，进勤工俭学预备班，要我去长沙湖南教育会报到。接到信后，我非常高兴，立即凑了一些路费，赶到长沙。当时教育会的负责人之一是徐特立同志。为了作好出国准备，北京华法教育会分别组织了三处留法预备学校：一是北京大学留法高级预备班（即法文专修馆）；二是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级预备班；三是河北省高阳县布里村的留法工艺实习学校，是个初级班。我是被分配到高阳布里村预备班去的。

到长沙报到后，住了二十几天，我们一行二、三十人，由陈绍休带领去保定。同行的有肖拔、侯昌国、孙发力、颜昌颐、熊信吾、王人达兄弟等。我们乘车到保定时，站台上有不少人来接我们，还有人给讲了话。我记得在欢迎我们的人群中有蔡和森同志。后来据贺果回忆说，蔡和森和毛泽东同志等是特意由北京到保定，来迎接湖南学生的。他们把我和一部分同学安置在保定车站附近的泰安栈住下，另一部分住到了保定第一客栈。

到达保定的第二天，蔡和森等同志带领我们到市内一座不大的公园去聚会。公园内有一个小湖，湖旁甬道环绕，湖边假山重叠，风景宜人。我们这些人当中，有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欧阳钦等同志，我们还乘兴在湖边留了一张合影。游罢公园，我们去看了附设在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高级预备班。育德中学的学生宿舍在校园里边，留法高级预备班的学生宿舍在南关的一座大庙里。

在保定住了不久，我们留法初级预备班的同学，就由蔡和森同志带领前往布里村去了。由保定到布里村，约计八十华里。当时没有长途汽车，我们是坐骡子拉的带蓬的大铁轱辘车去的。蔡和森同志当时腿有病，手里拄着一根棍，但在旅途中，仍然非常关心大家。我们一路上，心情非常高兴，有说有笑，大约在当天下午，到了布里村。

布里村是个不大的村庄，离高阳县城十五华里。这里处在冀中大平原，四周—马平川。留法初级预备班为什么会设在这里呢？因为这里原来就有一个留法预备学校。那是当年华法教育会创办人之一李石曾办的。李石曾是高阳县

人，他早年留学法国，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辛亥革命前，他曾在法国办过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后来又在巴黎开办了豆腐公司，并从高阳县一带招募了一大批华工到法国去。所以，当时人们把高阳叫作“华工之乡”。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之后，李石曾等人在布里村办了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限为一年，以学习法文为主，同时学习文化课和粗浅的工艺技术。开始时，学校设在布里村东南角的一座三合院内，一九一八年秋，迁到布里村西南边的新校址，并改名为留法工艺学校。学校还附设一个简易工厂，设备虽少，也还可以学到一些粗浅的锻工、钳工工艺技能。这所工艺学校就是我们的留法初级预备班。这时，李石曾在政治上已经走向反动，但他从事留法勤工俭学活动，送了一些青年到法国去留学，在客观上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课程，有国文课、法语课，还学些物理、化学知识。此外就是经常到学校的简易工厂学习技术。厂子里的工人师傅很热心地教我们操作机器，使我这样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开始懂得了一些工艺技术知识和一定的操作技能，这就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作了初步的准备。

在布里村学习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蔡和森同志。他比我们大几岁，是我们的负责人。他负责带队，管理我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就象现在我们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一样。他的思想进步，生活俭朴，待人非常热情，工作兢兢业业。为了安排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总是不辞辛苦地奔波着。我们从湖南来的几十名青年，年龄普遍都

比较小，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还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很多事情自己想不到，也办不了。连我们的学习费用，伙食费，甚至零花钱，都是由蔡和森同志到社会上募捐，或是到华法教育会去筹措的。平时，不论吃的、住的、学习、劳动，他都为我们安排得非常周到。我们大家倒是很省心，所以能够专心愉快地学习。蔡和森同志既是我们的同学，又是我们的老师，他和我们同时学习法文，又当我们的国文教员。学校没有体育课，他却非常注重同学们的体育锻炼。在课余时间，他教我们练习武术。他还在学校前边的空地上，挖了一些和脚一般宽的土坑，要我们从土坑内直着腿往外跳。

我们在思想上受蔡和森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也是很深的。蔡和森同志帮助我们初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我记得，他平时非常注意报纸上的消息，特别关心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他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很能说服人。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蔡和森同志经常给我们读报，讲时事，宣传十月革命，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每当读到布尔什维克在前线胜利的消息时，他总是兴高采烈地挥动胳膊大声说：劳农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蔡和森同志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对十月革命的强烈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一九一九年初，蔡和森同志去北京，我和几个同学从布里村来到保定去送他，那天正是旧历除夕，火车厢内空

荡荡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旧历除夕，中国传统习惯是全家团圆的日子，而蔡和森同志却不顾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独自坐在那空荡荡的车厢里，为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革命而思虑，而奔走，我们的心里深受感动。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这次离开后，我们大家都日夜想念他。

我们在布里村学习了将近一年。一九一九年的春夏之交，我和一部分同学从布里村留法初级预备班来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级预备班。这里的教员、教学和工厂设备条件，都比布里村好一些。我们到保定时，先在这里学习的青年张昆弟、李富春、李维汉、欧阳钦、贺果等同志已经毕业去上海，在那里通过华法教育会办手续，等候乘船去法国。我们就住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即保定南关的破庙里，继续学习法语和工艺技术，并且仍然坚持体育锻炼，每天清晨沿着护城河练长跑。在这里学习时间不长，由于我们急于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很快到了北京，找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手续去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底六月初，正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我们来到北京。一到北京，就和北京青年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六三”革命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记得，我们当时同许多青年学生一起，到北洋政府所在地新华门前去示威请愿，抗议军阀政府镇压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要求全部释放“五四”被捕学生。我们在新华门前的院内坚持了一天一夜，晚上就露宿在新华门前的院子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各界人士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给我们

送来饮料和食物，这更使我们忘掉了疲倦，增强了斗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广大革命群众那种高涨的革命情绪，为祖国独立解放而战斗的革命精神，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在北京期间，我们十几名湖南青年，经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的介绍，住在后门外豆腐池胡同九号。这是杨开慧同志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老先生的住宅。他非常热心地支持我们赴法勤工俭学，不仅把自己的家腾出来让我们住下了，还多方呼吁，为我们捐款筹措路费。杨老先生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养病，为了给我们腾房子，他把全家都搬到西山去了。这对我们是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事实说明，象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农村青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的正确引导和教育，没有杨昌济老先生和杨开慧同志的亲切支持和关怀，是没有条件参加“六三”运动、经受“五四”的战斗洗礼的，当然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是我终生引为自豪和感到无限幸福的。这些前辈们已经相继离开人间，但他们对我的亲切关怀、给我的温暖和教诲，将永远记在我的心中。

我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经常派代表去找熊希龄，要求解决赴法路费问题。熊希龄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还掌握着湖南省的大笔公款，但他总是推拖不予解决。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经人介绍，我进了北京的权

度制造厂当杂工，白天到工厂干活，晚间去一个私人寓所学法文。

大约在一九一九年底，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聂云台开办的恒丰纱厂去做工。直到一九二〇年四月，熊希龄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每人四百元光洋。其中一百元是赴法船费，二百元是赴法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六十元是制作出国的服装费，四十元是杂费。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其中包括北京法文专修馆毕业生二十人，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生十六人，另外还有长辛店预备班二人，天津永和厂实习生二人。我当时是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生的名义去领取贷款的。同我一起去领贷款的还有肖拔、侯昌国、姜绍丞、孙发力等人。我们几十人从上海霞飞路湖南善后协会贷款经理处借到这笔旅费后，就等着起程去法国了。

(二)

一九二〇年五月中旬，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特货尔兰蓬”号（Ahdiéiehon），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约有三、四百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

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外，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据说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同志，当时我们不认识。

我们买的全是四等舱船票，所谓四等舱，就是邮船最底层的无等统舱。在大统舱里装了不少活牛，这是因为船上没有冷冻设备，蔬菜又少，带着活牛以备航海途中现吃现宰。我们几百人就睡在牛栏旁边。那时已经是夏天了，统舱里闷热，加上牛粪，臭气熏天，船身又摇晃不止，很多人头晕呕吐，吃不下饭。一路上是很遭罪的。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据说沿途水中还有鱼雷没有扫清，精神上的压力很不小，很怕船只碰上出事。为防万一，船上给每人发了一串软木塞，作为救生工具。

我们乘坐的这艘邮船，从上海启程，经香港、海防、西贡，绕过新加坡，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又经非洲东部的吉布提，之后进入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塞得港进入地中海。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之中航行了四十五天，才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最大的商港。那里有石油加工、化工、机械制造、造船、纺织、橡胶等工厂，是法国对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主要贸易港口。

到达马赛港，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的代表和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在码头上接待了我们。上岸后，大家感到异常奇怪，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居然是一个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真是咄咄怪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无